

# 瞿秋白主编刊物特色及其社会影响力

高辛凡 蒋辰雨

**摘 要：**瞿秋白作为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先驱和无产阶级新闻出版事业的开拓者，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及苏俄的政治、经济制度在中国的本土化书写与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国现代早期新闻传播与出版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过往的相关文献研究多聚焦于瞿秋白的政治建树和办报经历，该文通过梳理与分析瞿秋白主编刊物的经历、成果与刊物导向，发现瞿秋白主编的刊物不但适时反映并引领了早期现代中国的共产主义等社会思潮，也对当时社会上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普及与深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关键词：**瞿秋白；办刊经历；刊物导向；马克思主义；社会影响力

**作者简介：**高辛凡，男，编辑，博士研究生。（《未来传播（浙江传媒学院学报）》编辑部，浙江杭州，310018）

蒋辰雨，女，本科生。（同济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上海，200092）

**中图分类号：**G2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418 (2020) 05-0104-07

## 一、瞿秋白的新闻事业与办刊经历

### （一）瞿秋白的早期新闻经验积累

1919 年五四运动之后，瞿秋白最初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致力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一直到 1935 年被国民党俘虏后英勇就义，瞿秋白短暂的一生最为人熟知的身份就是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与颇具声望的革命家。在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瞿秋白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新闻实践经验，拥有很高的新闻素养，并逐步形成了先进的政治思想与觉悟。

1920 年，瞿秋白和李宗武及俞颂华一起作为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的特派记者前往十月革命之后的苏维埃俄国（简称苏俄），成为中国早年新闻事业中较早外派的新闻工作者。在驻苏俄时期，瞿秋白积极参加俄共（布）和共产国际的会议和活动，深入采访机关、学校、农村、工厂，接触社会各界人士，为其之后投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宣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苏俄的两年内，瞿秋白受到先进的共产主义思想浸润，成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并撰写了介绍苏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教育情况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报告文学集，成了当时“最早有系统地向中国人民报道苏俄情况的新闻界先驱”<sup>[1]</sup>。

1922 年，瞿秋白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11 月，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翻译人员的身份参加在苏俄举行的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为陈独秀做翻译工作。瞿秋白凭借娴熟的俄文翻译水平和对共产主义的热忱受到陈独秀的赏识，这为其之后接手陈独秀成为《新青年》的主编埋下了伏笔。

在陈独秀的邀请下，瞿秋白结束驻苏俄特派记者的生涯回国，并经陈独秀举荐，长期负责党中央的报刊宣传工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报刊思想体系。在苏俄的两年，瞿秋白详尽地考察了这个新型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体系以及意识形态的变革，并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革命思想，成为一名笃信民主与科学、追求共产主义的左翼知识分子，这也为他日后主编期刊的主旨思想奠定了基础。驻苏俄的岁月里，瞿秋白已经开始借鉴苏俄的历史经验与政治形态，研究与分析当时中国面临的问题，探索中国社会阶级分化的原因与性质，寻求救国救民的办法。

1923年夏，瞿秋白出任当时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的系主任，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干部。他主要教授“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两门课，全面系统地介绍历史唯物主义。

## （二）瞿秋白的办刊经历

在办刊方面，瞿秋白创办《新社会》《人道》，主编了《新青年》《前锋》《向导》等中国共产党的喉舌刊物。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瞿秋白与瞿菊农、耿济之、郑振铎等人在北京创办了《新社会》旬刊。刊物以“改造社会”为宗旨，瞿秋白不仅是杂志编辑，更是主要撰稿人，发表了包括《中国的劳动问题？世界的劳动问题？》《新的声音》等22篇文章，主要宣传新思想和新文化，以及对社会主义思想展开讨论，标志着瞿秋白通过创办报刊宣传革命思想、鼓动社会改造的开始。

《新社会》在创办了19期之后，于1920年被当局查禁。同年8月，《新社会》的原班人马又创办了《人道》月刊，但由于编辑部内部思想不统一，又迫于当局的压力，《人道》杂志仅出版一期就被迫停刊。<sup>[1]</sup>

1923年，为加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的宣传，中共中央恢复了《新青年》的出版，而这一重要党刊的筹办和主编工作都由瞿秋白完成，这与他扎实的新闻功底、优秀的新闻素养、丰富的办刊经验以及在新闻界中的影响力密不可分。同年，在接手《新青年》期间，瞿秋白还主编了中共早期的另一前沿性刊物《前锋》。<sup>[2]</sup>

1926年《新青年》停刊。1927年10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了全新的中共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瞿秋白被任命为刊物的编辑委员会主任。

## （三）瞿秋白主编刊物的主要思想内容

在瞿秋白的办刊经历中，《新青年》杂志是不得不重点提及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期刊。从1923年《新青年》的再版发行，到1926年终刊，该刊物的文章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思想纲领为主旨，这一时期的实践也为他之后创办其他刊物打下了基础，具有开创性意义。

《新青年》是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杂志最初名为《青年杂志》，1916年9月正式改名为《新青年》。刊物创办初期带有明显的陈独秀思想理念的印记，秉承“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尽思想革命”，旨在发扬“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这三个近现代文明的特征，促进新时代青年的自身觉悟和观念进步，鼓励当下青年追求自由、科学和民主，是新文化运动兴起的重要标志。《新青年》当时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轮流编辑。以倡导民主、科学，提倡新文学为主要内容，曾经刊载过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陈独秀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等体现当时社会新思潮的文章。

《新青年》自1920年开始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刊物地位和意义非同寻常。杂志在1922年7月休刊，1923年重新出版，改为季刊，由瞿秋白接手成为主编。自1925年4月开始，《新青年》改为不定期刊物，1926年7月由于北伐战争而停刊。

与《新青年》相比，《前锋》编辑出版的内容颇有不同。《前锋》创刊于1923年7月，中共中央当时对《前锋》的主要定位是宣传中共“三大”确定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指导和推进国民革命。所以，《前锋》的特色体现在更为注重实际的内容，同时较多运用调查材料和统计数字剖析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共同本质和不同手法，详述苏联的社会主义经验，剖析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揭露军阀的独裁统治，指导和辅助党的建设及工作。《前锋》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促成之后因为完成使命而停刊。

与其他中国共产党的党刊相比，《布尔塞维克》不但政治立场更为鲜明，而且栏目设置也极为丰富。刊物设有“国内政治”“国际状况”“职工运动”“农民暴动”“中国革命问题”“列宁主义理论问

题”“寸铁”“读者之声”等专栏。刊物最初设计为 16 开本，每周出版，每期篇幅大约 40 页。《布尔塞维克》常用大量篇幅宣传中共中央制订的总方针。瞿秋白主编的这一刊物还非常善于总结经验，与时俱进，能够及时刊登中共中央的诸多决议、指示和重要文件，发表众多关于探讨和研究当下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转载与共产国际和社会主义有关的文献内容，《布尔塞维克》从而在当时成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政治喉舌。<sup>[2]</sup>

## 二、瞿秋白主编刊物的独特性

### （一）《新青年》：从全面呈现各种社会思潮到侧重宣传共产主义

瞿秋白认为，共产党的报刊要实现历史使命，必须在内容上以严格的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科学，探求社会发展的规律，以便指明中国社会思想的正当轨道。要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理论联系实际，表现社会思想的渊源，激发革命情绪的观感，并以综合的眼光立足分析整个世界的现状。<sup>[3]</sup>

《新青年》杂志在创刊初期的主要撰稿人多为安徽籍，之后虽达到了撰稿人地域来源的多样化，但主要作者多为创办人陈独秀的好友，包括汪叔潜、陈瑕、李亦民、高一涵、易自沙、刘叔雅、李大钊、胡适、吴稚晖、吴虞、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从杂志的第三卷开始，作者队伍加入了蔡元培、章士钊、钱玄同等资深学者和毛泽东等在校爱国青年。北大教授群体包括胡适、李大钊和鲁迅等知名学者的加入，使刊物在当时名声大噪。这一时期的《新青年》内容百花齐放，主要高举科学和民主大旗，批判封建道德与思想，对各种社会新思潮包括马克思主义、新村运动、无政府主义、工读互助主义等思想主张兼容并蓄。例如，有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也有崇尚无政府主义的黄凌霜的《马克思学说批评》，还有周作人宣传新村运动的《游日杂感》《新村的精神》。可以看到，当时的《新青年》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探讨与宣传只是杂志内容的一部分，尚未成为研究重点和焦点，刊物仍然更偏向于文学性与思想多样化，兼顾批判性。<sup>[4]</sup>

1920 年之后，在国家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新青年》杂志开始侧重政治讨论，强调民主政治是创造新时代的必经过程，也是发展新社会的有用武器，思想上的碰撞和现实的政治斗争应该结合起来，这是《新青年》由纯文学性杂志转向主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关键时期。杂志当时还新增“俄罗斯研究”专栏，系统讨论十月革命之后苏俄革命的指导思想、社会状况、罢工运动和社会主义。

1923 年，瞿秋白接手后的《新青年》杂志已明确承担了中共中央早期机关刊物的历史使命，成为中国社会思想的前驱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指针。作为党的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捍卫中国共产党是最为显著的特色。瞿秋白清楚地意识到报刊的舆论阵地作用，期刊不仅是传播社会进步思潮的有力载体，也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强大工具，更是一个政党掌握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的强力助手。他认为，重新启航的《新青年》杂志应继承五四精神，秉承新闻真实性原则，客观全面地分析和解释当下中国的真实状况，同时致力于提出和探讨解决当时中国社会问题的道路和方向。

在瞿秋白担任主编期间，《新青年》的编辑和撰文作者大多为中共党员。瞿秋白曾以屈维它、巨缘等化名，亲自撰写了许多介绍与解读马列主义的专题文章，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国的革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凭借驻俄记者的独特经历与优势，瞿秋白对苏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有着更为清晰的认识。他个人宣传列宁、斯大林以及国际共产主义的文章就多达 22 篇。

瞿秋白还特意将《新青年》的复刊号办成共产国际专号。其中刊登的《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主义》一文探讨了共产国际的纲领问题，《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一文讨论了共产国际的策略性问题，而《共产国际第四次大会统观》则详细介绍了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的相关内容。这些文章的刊登展现了瞿

秋白的办刊理念与坚定宣传共产主义的初衷。他还出版了“列宁号”，用以集中宣传和阐释列宁主义理论知识。精通俄文的瞿秋白还亲自翻译了列宁的《俄罗斯革命之五周年》、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等著作，向刊物读者详尽地传递了无产阶级政党之于革命胜利的特殊意义。<sup>[5]</sup>

瞿秋白在《列宁主义概论》中写道，列宁所处的是帝国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的理论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再从这种实际工作中的经验里锻炼出来的，所以对帝国主义时代、世界革命已经可以实际开始时的具体策略问题，如无产阶级独裁与农民阶级、无产阶级社会革命与殖民地民族革命之关系等问题，便有格外详尽的研究，发见许多新的原则”<sup>[6]</sup>。

面对错误的思想理念，《新青年》也勇于批判。当时，《新青年》对梁启超的不可知论展开过尖锐的批判和论战。这些都是瞿秋白拥护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坚持刊物政治主张与导向的体现。

## （二）《前锋》：以反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为主

五四时期，正是中国社会动荡与变革的历史转折期，当时的社会为各种新式思想的碰撞提供了摇篮。新文化运动推动中国文化由封建主义向民主科学转型。在这一时期，受到具有时代意义的《新青年》的影响，宣传民主思想的各类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胡适曾回忆说，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全国的青年都开始异常活跃起来。大学生甚至是中学生们都参与办小报来表达言论。<sup>[7]</sup>在这些报刊中，比较著名的有四个刊物：《晨报副镌》《学灯》《觉悟》和《京报副刊》。

《晨报副镌》是北京《晨报》的副刊，1921年在鲁迅的支持下开设，主要刊载学术演讲、小说、小品以及诗歌等偏重文学性的体裁。《学灯》是综合性刊物，属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报纸《时事新报》的副刊。1918年3月创刊，1947年2月停刊，期间进行过多次内容改革，政治立场较为保守。《觉悟》是1919年创办，1920年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阵地。1925年后，改由恽代英担任主编，这一时期的《觉悟》刊登了很多共产党人的文章，可以说办刊理念与瞿秋白最为接近。《京报副刊》的办刊时间较晚，创立于1924年，由孙伏园主编，1926年因为邵飘萍的遇害而停刊。<sup>[8]</sup>

这些刊物在内容上都较偏向学术性，主要以对社会思潮的评论、研究论坛内容、新文艺作品的译述和通讯文章等为主，没有明确统一的思想与风格。例如，《晨报副镌》设有“电影”“游记”“剧谈”“评述”等专栏，《学灯》有“文艺”“译述”“讲坛”“科学丛谈”“随笔”等板块，《觉悟》的常设栏目包括“评论”“演讲”“科学”“小说”“戏剧”“诗歌”“社会调查”“文学研究”等，而《京报副刊》也有“哲学”“历史”“经济”“伦理”“文学”“艺术”“科学”“宗教”等板块。<sup>[8] (27)</sup>在这四大最为著名和有代表性的刊物中，《觉悟》的地位最高，因其站在思想前沿，最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与无产阶级战斗意识，但它还是不如瞿秋白主编的刊物那样始终如一地坚持传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因而，在时代性和思想前瞻性方面，瞿秋白主编的刊物都享有更高的政治评价及历史地位。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瞿秋白不仅致力于宣扬共产主义，还坚持刊物主题与内容的与时俱进。

在主编另一本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前锋》时，瞿秋白则主要反对帝国主义宣传，剖析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揭露封建军阀的政治压迫，强烈谴责英美等列强在中国的掠夺及对中华文化的破坏。从历史的时间线来看，瞿秋白在主编《新青年》和《前锋》的时候，正是中共革命统一战线策略的酝酿和形成之际，他根据中共三大提出的实现国共合作的精神，大力宣传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后来国民党右派破坏了国共合作的革命统一战线，企图夺取革命领导权之时，瞿秋白又与时俱进，揭露国民党的阴谋，谴责国民党的行径。瞿秋白在1926年1月的《新青年》刊物上发表了《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一文，发动舆论武器，针对国民党右派破坏合作的行为，予以及时反对与驳斥。可以说，瞿秋白主编的刊物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也是紧扣中共中央方针政策与当时时局的。<sup>[9]</sup>

瞿秋白主张中国无产阶级建立起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当时国民党右派宣扬阶级调和，反对阶级



斗争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要求共产党退出，破坏革命的统一战线。作为反击，瞿秋白在《新青年》中写道：“资产阶级看着无产阶级的势力足以导国民革命于胜利，看见过命定的进行中资产阶级要牺牲自己的私利——其实不过是容许工人农民组织和斗争的自由、极普通的民权，于是开始反动而求争回革命的指导权以消灭革命。”<sup>[10]</sup>

### （三）内容具体真实，文风平民化、通俗化

在办刊过程中，瞿秋白始终坚持和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立志要办群众都能看懂的报纸和杂志。瞿秋白组织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组织问题决议案》，他指出：“党报不仅是统一党员意志的指南，而且是鼓动群众、说服群众、组织群众的利器。”<sup>[9] (152)</sup>他在坚持新闻真实性的前提下，贯彻报刊必须要立足于具体的、真实的、不夸大不吹牛的新闻立场，要善于运用具体的事例来动员群众，向广大群众宣传中共的口号和方针政策，从而提高党报、党刊的威信，加强宣传效果。

早在驻苏俄期间，瞿秋白就秉行并贯彻新闻真实性的原则。当时刚刚经历了十月革命的苏俄在经济上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其国力与人民生活水平尚未恢复。苏俄人民生活艰苦，各类社会问题也层出不穷，部分不怀好意的外国记者因此将苏俄形容成民不聊生的人间地狱。瞿秋白却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仅如实报道了苏俄的真实处境与所遇困难，也提到了布尔什维克党与苏俄政府为了振兴经济所推行的种种新政。瞿秋白的真实报道，打击了国内外反对社会主义势力的刁难和抹黑，使得远在中国的老百姓能了解到社会主义苏俄的真实社会情况。

“具体”是瞿秋白对党刊的另一个要求。他认为新闻的真实性要求通讯、消息等报道都应该是“具体地报道”，应写有名有姓的真人真事，而不是非具体甚至是虚假的东西，写人要有具体的语言、动作、心理甚至性格描写；写事要交代事件的起因、冲突和结局，不能用感想式的话来代替叙述，更不能以想象充当报道。瞿秋白认为：“必须使当前最主要的事实和运动，都有明晰的叙述，一期一期地继续下去，给读者以极清楚明了的概念，使他们认识革命的各种战线上的具体情形。”<sup>[9] (152)</sup>

为了更好地贴近群众，瞿秋白倡导大众化文艺理论，提倡党刊的文风应该通俗化、大众化，避免教条主义。他认为“九一八”以来的许多革命的公开发行刊物，包括杂志和小报都过于注重理论，是给知识分子看的，而不是为广大的人民群众写的。为了更好地向群众宣传共产主义思想，让广大群众都能理解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他坚持刊物内容要贴近人民群众，反映群众的诉求，使得劳动人民真正看得懂。这首先需要在文字上通俗化处理，尽量使用方言和口语，贴近群众的语言习惯。

## 三、对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及历史地位

### （一）瞿秋白主编刊物的社会评价

《新青年》受到的社会赞誉主要针对的是陈独秀为主编的时期，瞿秋白继承了其优良口碑并将之继续发展。在瞿秋白主编的刊物中，《向导》获誉最多。《向导》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时代产物，在当时起到了非常好的宣传效果和动员组织作用。读者对《向导》颇多赞誉，认为它是“四万万踏在国内外强盗脚下苦难同胞的赤卫军之先锋队”<sup>①</sup>，是“在黑沉沉底下的中国的一线曙光”<sup>②</sup>，更是“四百兆同胞的救命符”，是“国民革命的导师，也是工人阶级的喉舌”<sup>③</sup>。1923年12月，北京大学在建校25周年纪念日时，发起过一个关于“最受欢迎周刊”的民意调查，参与调查者以学界知识分子和市民为主，约1007人，《向导》获得224票，名列最受欢迎的周刊之首。不过，由于《向导》周刊中的文章大多

① 引自《向导》，1923年5月16日第25期的《读者之声》专栏。

② 引自《向导》，1923年5月30日第27期的《读者之声》专栏。

③ 引自《向导》，1922年10月25日第7期的《读者之声》专栏。

对国民党有严厉的批评，使得国民党对此刊有诸多不满，《向导》在广州被评为最不受欢迎的刊物。<sup>[11]</sup>

上海同济大学教授丁晓强认为，《向导》的主编是中共早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主要办刊人员是由革命家组成的战斗集体，作者队伍也都是清一色站在斗争一线，被誉为黑暗中国的“一盏明灯”，苦难同胞的“思想向导”。

丁晓强评价《向导》是中共第一份全国性政治刊物，与党的理论刊物《新青年》《前锋》一起都是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在《新青年》和《前锋》上的广告词是“国内唯一无二之政治刊物”“国民必读之向导”“中国革命理论和政策的向导”，是“全国最急进的刊物”。<sup>[12]</sup>

《向导》的读者越来越多，革命力量薪火相传，影响还远至法属印度支那、德国、法国、日本等。从创刊起，党的主要理论家、宣传家都在《向导》上发表了大量重要文章，它也是当时直接指导国民革命和工农运动实践的最有影响的刊物，在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 （二）瞿秋白主编刊物的历史地位

瞿秋白担任主编、创办和编写刊物的时期，正是中国大革命由兴起到发展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一阶段的中国经历了由封建迷信向民主科学的发展，在思想领域的论战、争议异常激烈与复杂，各类思想和声音层出不穷。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人开始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现状相结合，用共产主义思想指导中国的民主革命，鼓舞无产阶级发起各种斗争获得政治话语权。而在这一过程中，瞿秋白主编的刊物以言论为重要工具，对革命的最终胜利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理论支持。

瞿秋白在办刊过程中的宏大格局和宽广视野也颇为突出。他的选题思路、文章主旨及组稿方向立足于全中国和中华民族的荣辱复兴的高度，着眼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形势，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武器，致力于研究和分析瞬息万变的形势发展，在刊物中提出和阐明革命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和中共中央的革命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正确的论断，为分析社会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为中共党刊发挥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宣传阵地作用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可以说瞿秋白主编的刊物在近现代中国达到了其他左翼刊物难以比肩的高度。<sup>[13]</sup>

以《新青年》为例。《新青年》是中国较早系统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精髓并强调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农群众相结合的刊物。正因为瞿秋白是中共党内最早研究中国社会性质的领导人之一，《新青年》及瞿秋白主编的其他刊物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的社会性质很早就有了精准的判断，成了中国共产党制定民主革命政策的客观依据。同时，瞿秋白主编的刊物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同时，也会提供具体方法论的指导，决不是纸上谈兵。例如，瞿秋白在刊登于《新青年》的《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一文中指出，文化包括生产力、经济关系、社会政治组织、社会心理和各种思想体系，其中生产力是决定其他三个方面的最终动力。研究文化也必须遵循此程序，如果只知道研究文化思想，忽视其物质基础，则“无异乎‘竖蜻蜓’之首足倒置”。<sup>[14]</sup>

## 四、结 语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内创办党刊的先驱，也是较早提出并落实党刊作为党的“喉舌”的党内领导人之一。依靠瞿秋白扎实的新闻素养与文学功底以及丰富的驻外记者经验，他不仅个人拥有极高的文化造诣，更将文学性与党性相结合，充分发挥了自身爱国文人及左翼政治家双重身份的社会影响力。<sup>[15]</sup>

瞿秋白预见性地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发展群众路线的核心是扩大群众基础，而这一艰巨而伟大的任务需要理念普及和思想传播。瞿秋白将对马列主义及共产主义的深刻而独到的认识集中体现于办刊主旨中，把思想理论和中共的革命实践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及对其本质的解读向当时社会

上的广大读者作递进式的传播，逐渐形成号召无产阶级革命的舆论场。同时，在客观上，瞿秋白主编的刊物也为之后知识分子或革命家办刊提供了重要参考，通过瞿秋白的办刊思路，编者意识到不只是报纸、书籍，发挥好期刊舆论阵地作用，同样可以有效传递和深化政治思想，反哺革命事业。

瞿秋白主编的刊物成了中共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重要载体，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办刊思想上来看，瞿秋白是五四时期为数不多的从办刊初期开始就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新闻人和革命家，且能与时俱进，使刊物内容与中共方针政策做到相辅相成。从刊物的历史地位来看，《新青年》是当时社会上其他期刊的首选参照，而之后的《前锋》《向导》等刊也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左翼刊物。虽然这些刊物都带有强烈的时代特色，但瞿秋白主编刊物的实事求是，坚持以群众为核心的刊物特色与理念，值得中共党刊一直传承下去。

### 参考文献：

- [1] 周小红. 瞿秋白的编辑实践及其新闻编辑思想与理论 [J].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2).
- [2] 张秋实. 瞿秋白创办、主编党报党刊的主要活动 [J]. 出版科学, 2004 (3).
- [3] 瞿秋白. 瞿秋白选集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226.
- [4] 王洁. 瞿秋白与《新青年》[A]. 上海鲁迅纪念馆. 纪念《新青年》创刊 100 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C].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5: 292-302.
- [5] 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M].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41-43.
- [6] 瞿秋白. 列宁主义概论 [J]. 新青年, 1925 (1).
- [7] 唐德刚. 胡适文集 (第一卷)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332.
- [8] 姚福申, 管志华. 中国报纸副刊学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27.
- [9] 蓝鸿文, 许焕隆. 瞿秋白 [M].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5: 152.
- [10] 瞿秋白. 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阶级分化——国民党右派与国家主义派之分析 [J]. 新青年, 1926 (3).
- [11] 朱务善. 本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之民意测量 (二续) [N]. 北京大学日刊, 1924-03-06.
- [12] 丁晓强. 国民必读之向导 [N]. 新民晚报, 2018-02-06 (A03).
- [13] 朱国圣, 林枫.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 [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 83.
- [14] 瞿秋白. 瞿秋白文集: 政治理论编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8: 124-125.
- [15] 《忆秋白》编辑小组. 忆秋白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32.

[责任编辑: 赵晓兰]